

《中华印刷通史》第五章第四节

东晋木刻入山符与梁代反书倒读华表的刻印

[作者] 张树栋, 庞多益, 郑如斯

[单位] 大中华印艺网

[摘要] 经过数千年的进化, 到东汉末年, 印刷术的物质、技术条件均已具备, 尤其是纸的发明和完善, 为印刷术提供了远胜于织物且又价廉的承印材料。东晋元兴二年(403年), 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字敬道, 又名灵宝)废晋安帝于十二月称帝, 改国号楚, 年号建始, 后改永始。次年(404年), 桓玄下令废简用纸。这说明纸的质量和产量在公元五世纪初已经达到可以代简、普遍采用的程度。无疑, 这对印刷术的成熟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 由于南北朝所处数百年间, 社会动荡, 战争频仍, 严重影响着文化事业的发展, 致使迄今我们尚未发现有关印刷术、特别是雕版印书的文献和文物证据。然而, 东晋葛洪着《抱朴子》所载“木刻入山符”和梁代反书倒读华表的刊刻, 却预示着两晋南北朝时期乃是以纸为承印物的印刷术的发端。

[关键词] 中华印刷通史, 印刷术, 张树栋, 庞多益, 郑如斯, 大中华印艺网

经过数千年的进化, 到东汉末年, 印刷术的物质、技术条件均已具备, 尤其是纸的发明和完善, 为印刷术提供了远胜于织物且又价廉的承印材料。东晋元兴二年(403年), 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字敬道, 又名灵宝)废晋安帝于十二月称帝, 改国号楚, 年号建始, 后改永始。次年(404年), 桓玄下令废简用纸。这说明纸的质量和产量在公元五世纪初已经达到可以代简、普遍采用的程度。无疑, 这对印刷术的成熟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 由于南北朝所处数百年间, 社会动荡, 战争频仍, 严重影响着文化事业的发展, 致使迄今我们尚未发现有关印刷术、特别是雕版印书的文献和文物证据。然而, 东晋葛洪着《抱朴子》所载“木刻入山符”和梁代反书倒读华表的刊刻, 却预示着两晋南北朝时期乃是以纸为承印物的印刷术的发端。

一、木刻入山符和督摄万机印

东晋时期, 道教作家葛洪(字稚川, 句容人, 自号抱朴子)所著《抱朴子》(以号命书名)内篇“登涉”卷十七载有“入山佩带符”(图 5-8), 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同卷又有:“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 皆佩黄神越章之印, 其广四寸, 其字一百二十, 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 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一块大印章, 上面刻着 120 个反体字, 用来在所住之四方压印出正体文字, 这与当今仍有使用的平压平式凸版印刷机原理相同, 印法相似。所不同者, 一为印在泥土之上, 一为印在纸上。史载, 两晋时期, 除葛洪《抱朴子》记载的木刻入山符之外, 还有一块更大的木印“督摄万机印”。这块“督摄万机印”, “以木为之, 长一尺二寸, 广二寸五分, 背上为鼻钮, 钮长九寸, 厚一寸, 广七分。”[ZW ()《隋书》卷十一, 礼仪志, 第六。[ZW]如此大的一块木版印, 而且是把字印在纸上, 尽管它有钮, 采用盖印的方法, 但实质上与印在纸上的印刷术没有什么区别了。

二、梁代反书倒读华表的刻印

南北朝时期的梁代(502-557年)梁武帝, 于天监元年(502年), 追尊其皇考萧顺之为文皇帝, 庙号太祖, 在其镇江墓前竖立石兽、石碑、华表。其中, 华表呈十字形, 在华表的横石上刻有“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大字。华表分左右两个, 左面华表上的八个字是阴刻正字, 右面华表上的是阴刻反字(图 5-9)。

这种反书倒读的刻法, 与后来的雕版印刷完全一样。只要在华表上涂墨, 然后敷纸刷印, 印在纸上的便是正体顺读的印刷品了。据载, 这反书倒读的阴刻华表, 是为了印下来送给参加祭祀的官吏作纪念品用的。应该说, 在华表上刻反书倒读的文字, 用途是明显的。这足以证

明，早在公元六世纪初的梁代初期，中国已经出现了用反刻文字取得正体文字的木版雕印技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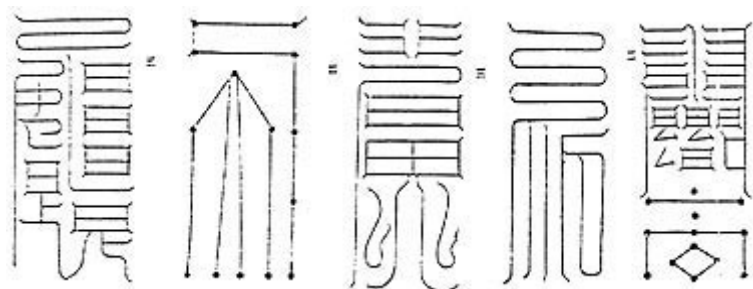


图 5-8 木刻入山符

结语

在印刷源流史上，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拍印和树皮布印花，到隋唐时期的雕版印书，长达数千年，是印刷术的准备时期，因此我们称其为“源头期”。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没有长达数千年的源头期的准备，就不可能有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的推广使用。就像没有母亲的十月怀胎，就没有婴儿的呱呱堕地一样，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源头期的准备，归纳起来，一是技术准备，二是物质准备，三是文字准备，四是社会需求。这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何以言之？

1. 印刷术是工艺技术，有着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法。这套方法之中，既要有用于雕刻印版的精湛、娴熟的手工雕刻技术，又要有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去的转印复制技术，在生产力发展缓慢而又极为低下的源头期（按、指隋唐以前），作好这两方面的技术准备，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进展也是相当缓慢的。在手工雕刻技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由彩陶刻划，而甲骨、金石镌刻，发展虽然缓慢，但进步却卓有成效。其中尤以碑刻在促使手工雕刻技术进一步精湛、娴熟方面发挥的作用为着；转印复制术虽萌芽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拍印和树皮布印花，但更为重要的、关键性进展是秦汉时期的盖印封泥和模印砖瓦。封泥盖印和砖瓦模印，是转印复制术由压痕向朱墨拓印乃至雕版印刷发展的前奏曲；转印复制术发展到拓印和织物印刷中的凸版压印和夹纈漏印，已经是雏形中的印刷术了。正是这种雏形中的印刷术与以印章为主的盖印术的结合，直接促成和完善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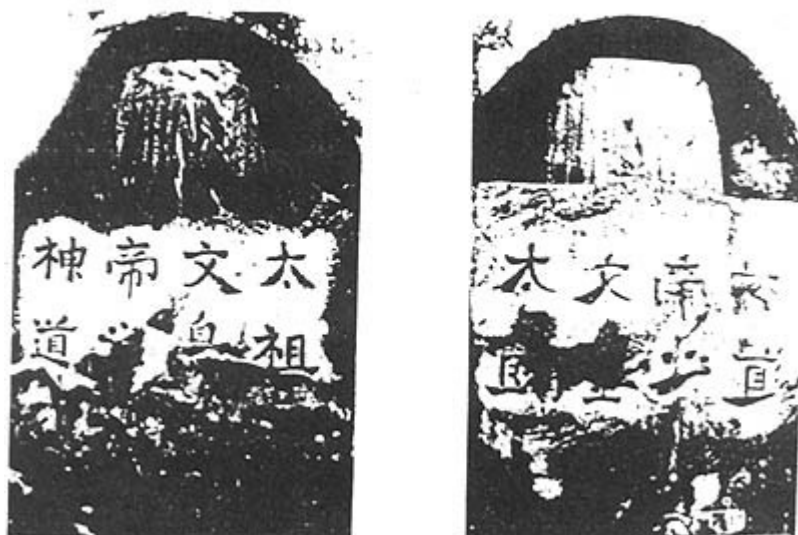


图 5-9 梁代正书顺读与反书倒读的华表

2. 印刷术作为工艺技术，它的实施，自然需要笔、墨、纸、织物，以及雕版工具和木板等原材料的具备。这些原材料，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到东汉末年，已能适应印刷术的要求。为完善印刷术奠定了物质基础。

3. 文字是印刷术的主要对像和复制内容。文字产生之后，首先用于刻划。笔的发明和完

善，加速了文字的演变进程。先甲骨，后金石，再竹木，又帛书，使文字沿着籀、篆、隶、楷之路逐渐向规范化演进。没有文字的发展，就不会有雕刻技术的娴熟。可见，文字的发展和规范，对印刷术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4. 历史上任何工艺技术，无不以社会需要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社会的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直接促成了印刷术的发明，而且在印刷术的整个准备时期中，包括手工雕刻技术、纸墨笔的发明和发展，以及文字的产生和规范等在内的所有准备工作，无不因社会需求而诞生，随社会的需要而发展。是社会文化事业的需求直接导致了印刷术的发明，促进着印刷术的发展。

综上所述：笔的发明和改进，使得中国的文字向着简化、工整、规范和易于镌刻、复制的方向发展；织物、纸和墨的发明、发展和应用，为印刷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承印和转印材料；以手工雕刻和转印复制技术为基础的盖印和拓印以及织物印花技术的不断完善和结合，为印刷术的发明奠定了技术基础；社会的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造就了发明印刷术的社会环境和客观要求。这四者的具备和结合，使得印刷术的发明成为历史的必然，至隋、唐时期开始推广应用了。